

秘密 经济战

抗战时期中国
对日伪经济战纪实

罗泰琪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秘密经济战

抗战时期中国
对日伪经济战纪实

罗泰琪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经济战/罗泰琪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17. 10
ISBN 978-7-5177-0751-6

I. ①秘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经济史—中国—民国
IV. ①F1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8536 号

书 名: 秘密经济战

著作责任者: 罗泰琪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77-0751-6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2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联系电话: (010) 68990642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络订购: <http://zgfcbs.tmall.com/>

网购电话: (010) 68990639 88333349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devel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: 271799043@qq.com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序言

勿让经济抗战群体湮灭青史

近些年，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，关注军事抗战、政治抗战、外交抗战的作品非常多，但是有关经济抗战的研究却并不多。其实，中国抗战时期经济战线上的抗战是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抗战时期，中日经济战刀光剑影，波澜壮阔，与军事、政治、外交抗战互为表里。中国经济抗战对时局以及战争形势的转化，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。

正是基于此，我开始耕耘经济抗战史料，反复阅读，深思熟虑，在浩瀚的文海里深入浅出，逐渐缕清了中国经济抗战的基本脉络。

抗战前，中国在经济抗战方面做了五大准备，即废两改元、对付白银风潮、修建川陕公路等国防战略基础建设、筹建国家银行、改革币制。日本自然极力破坏，阻挠中国币制改革，走私中国白银，加大白银风潮侵害中国，破坏中国外汇管理，掀起华资银行挤兑风潮。比如1935年1月11日，重庆多家银行发生空前严重的挤兑，踩死6人，踩伤15人，拉响全国金融危机警报。同一天，天津裕元纱厂厂长张万里突然对外宣布：裕元纱厂即日停工清理。天津裕元纱厂下设3个纺纱厂、1个织布厂，有7万纱锭、5000工人，创办于1918年，是华北最大的纱厂。最后，经过激烈竞争，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击败中国金城银行，夺得天津裕元纱厂。全国工商界为之震惊。

随即，日本加大对华经济侵略力度，抢购众多华资纱厂，企图为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奠定以战养战的工业基础。中国针锋相对，保护和收购破产华资工厂，大规模撤退银行资金，阻止和平息银行挤兑风潮，抢购囤积

战略、民生物资，保护法币，打击伪币，开辟滇缅路外贸通道，积极争取国际金援。举天津北洋纱厂为例。1936年4月24日，北洋纱厂股东会决定将工厂租给日商上海裕丰，并与之签订草约，收70万元预付租金。中方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联手抗日，暗度陈仓，通过天津棉花统治整理委员会，以匿名购买北洋为由，请他们驳回日商承租申请，待北洋解除与日商租赁草约后，再与北洋签订正式买卖合同，迫使日商退出承租。此事令全国工商界为之振奋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中国银行界、经济界、实业界人士，历尽艰辛，不远万里，将大批银行、工厂、公司等迁移到抗战大后方，积极开发大西南、大西北。他们在大后方重整旗鼓，恢复经济，为前方抗战送去一船船、一车车枪支弹药、军服被盖、后勤给养，展示出大后方强大的支持力量。日本则极力切断中国对外经济往来，封锁沿海海关，封锁滇缅路，阻止美国、英国援华。比如，中国要派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赴美争取美援。日本女间谍得知并获取胡笔江某日去重庆的飞机时间，通知日本军部。日本军部届时派战斗机拦截，击落民用飞机，杀死胡笔江。又比如天津中国银行的大撤退。七七事变后第3天，7月10日，天津中国银行的巨额资金和众多账簿危在旦夕。津行副经理束云章奉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命令，组织几十辆武装运钞车队，在天津沦陷前夕，将银行的400万银元和1000箱账簿文件偷运出津，昼夜兼程，南下1300里，于7月13日安全运抵郑州，躲过一劫。

为占领上海金融市场，阻止伪币发行流通，中国发起严惩汪伪银行大战，刺杀汉奸，破坏汪伪银行。日本和汪伪则实施更凶狠的武力报复，一次逮捕中方银行职员100多位，枪杀3个课长，并在上海中央银行多处营业点实施爆炸，致使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7人炸伤20人，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被炸死3人炸伤26人，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6人炸伤60余人，弹片四溅，血流遍地。上海滩金融业的血腥味丝毫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搏杀。

随着抗战深入，战略物资和民生物资日益短缺，中日物资大战越演越烈。中国政府组织和发动银行、单位、民众，给予政策、资金、交通方

便，去上海秘密偷运棉纱，去湖北半沦陷区抢购棉花，去浙江沦陷区抢购民用生活品，冒着生命危险运回大后方，稳定后方生产生活。比如湖北银行在鄂西半沦陷区于1939~1941年间，共收购桐油18万担，转送湖北桐油公司出口；发放茶叶贷款136万元，制成红茶达6000箱，交中国茶叶公司转运销售，与日伪虎口夺食，换取外汇。日本和汪伪政权则极力破坏抢购，并反其道而行之，在沦陷区、国统区交界线抢购战略民用物资，与中国展开抢购和反抢购的激烈战争。

一转眼，70余年已去，但中国抗战的激情壮烈依然让人心潮澎湃。而经济抗战作为中国抗战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，同样值得我们致敬。尤其是，在经济战场上为国奋战的人们，并不像军事战场的英雄们那样名垂青史，他们更多的是，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所能及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，为抗战作出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贡献，所以他们尤其需要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。

这是一个伫立于经济、金融领域的特殊抗战群体，他们的作为，他们的进取，乃至他们的徘徊，都是令我动笔写作本书的动力。在落满尘灰的故纸堆里寻找这一群体精英们在抗战时代的激情奋进，成功的荣耀一时，挫折的郁闷伤怀，更有蒙诟多年的委屈。在各种情愫中，这一特殊的抗战群体在笔下，逐渐立体、丰满了起来。而这，正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之所在。

最后，谢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工作，更谢谢读者朋友对中国经济抗战的关心以及对本书的大力支持。

罗泰琪

重庆化龙桥寓所

2017年7月21日

目 录

第一章 经济备战

- 一 废两改元 1
银行大楼砍一半 / 废除银两改币制
- 二 白银风潮 10
重庆银行挤兑案 / 天津裕元闹倒闭
申新七厂拒拍卖
- 三 沟通川陕 20
- 四 筹建国行 24
增加官股控中行 / 备现逃现如何好
- 五 币制改革 33
英美日等拉中国 / 商业银行乱纷纷

第二章 抗战前夜

- 一 接管工厂 42
接管天津裕丰厂 / 谁是神秘收购人
- 二 银行抗战 50
鸦片收购起风波 / 秘密转运四百万
桐油生意不好做 / 千万银元存洋行
挤兑提现两千万

三 挤兑风潮 69

银行停业歇四天 / 发行公债的故事
公债交割出问题

四 囤集物资 78

解散中日贸易会 / 囤集棉花为抗战
冒险去港买外汇

第三章 打破封锁

一 猪鬃出口 85

商贩控告古耕虞 / 难道要吃古青记

二 日商毁约 93

嘉陵厂胎死腹中 / 酒精厂亏盈有因
开煤矿五战三败 / 华昌矿不死不活

三 秘密走私 106

湖北银行抢购粮 / 重庆银行走私布
赊销桐油五百吨

四 黑市外汇 119

千万英镑被套走 / 不准在沪购军布
伪币发行很失败 / 法币牵制日伪币

第四章 迁往后方

一 抗战迁渝 131

交行重庆买房记 / 央行冒险收公债
金城经营大西南

二 豫丰西迁 143

政府有令迁豫丰 / 柏木小船闯三峡
两厂共争一块地 / 年底复工三千锭

三 金融烈士 149

重庆密电去美国 / 踢踏舞星是间谍
立法院长登机否 / 拆开信封不忍看

四 贷款奇遇 156

秘密乘坐美专机 / 不用管他啥外交
国务卿出国之机

五 贸易大战 160

华北禁止种棉花 / 是否进口美国烟
贩棉大王邓耀南

六 开发西北 169

先向宋子文要权 / 依靠张之洞遗产
使用西太后电机

第五章 金融大战

一 刺杀特使 183

强迫银行出资金 / 兄弟我在东京时
刺杀天皇两特使 / 全城封锁捉麻子
无期徒刑死监狱

二 香港落难 192

总经理化装出逃 / 通国汉奸俱乐部

三 银行大战 198

破坏汪伪发伪币 / 强迫四行撤租界

四 特工血战 207

血洗霞飞路银行 / 报复枪杀三课长

五 银行迁渝 213

宋老撤退到重庆 / 香港传来机密信
重庆金城管七省

六 美债风波 220

逢低吃进三百万 / 黑道银行杜月笙

盐场急需两百万 / 美国教士卖外汇

第六章 抢购物资

一 抢购物资 232

经济作战新政策 / 戴笠两月就辞职

抢购沪棉六千包 / 千里运棉费周折

二 浙江改变抢购法 244

三 囤集居奇遭处罚 246

四 美金公债 250

申请私购八亿元 / 捡到一封机密信

黄金提价泄密案

第七章 尾 声

一 姗姗来渝 259

军统抓了周作民 / 姗姗来渝求保护

二 纷纷而去 267

陈光甫飞去美国 / 在渝最后两件事

撤离重庆三政策

三 十亿法币运上海 273

四 结束语 275

第一章

经济备战

一 废两改元

银行大楼砍一半

要说经济战，首先得说银行，因为银行是经济作战的主要阵地，是为经济战提供资金和资金信息的枢纽部门。所以，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，特别是抗战前几年，未雨绸缪，中国和日本就围绕银行暗中较劲，揭开抗战时期中日秘密经济战序幕。

中国人开办的现代银行，最早的是中国通商银行，成立于 1897 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，发起人是清政府的铁路大臣盛宣怀，官督商办，实收资本金 250 万两银子，其中 100 万两来自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，78 万两来自李鸿章等一批官员个人，72 万两是民间商股，地点在上海外滩 6 号。盛宣怀时年 53 岁，江苏常州人，清末政治家，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。主要民商股东有宁波商人叶澄衷、严信厚、朱葆三等。至于李鸿章等官员的个人入股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过是对洋务运动有所表示，增强民商入股积极性。

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目的是“通华商之气脉，杜洋商之挟持”。这里的洋商，主要指外国在华银行，如英国丽如银行、法国法兰西银行、德国德意志银行、日本横滨正金银行、美国花旗银行、俄国华俄道胜银行、意大利义利银行等。

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 1893 年，比中国通商银行早 4 年，随

后在中国多地设立分行，是日本在华最大银行，主要致力于控制中国政府和大型企业，比如多次贷款给袁世凯政府，配合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通过多次巨额贷款，控制汉冶萍公司等，是日本对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充当日军侵略中国的金融打手，罪恶累累，于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被盟军统帅部取缔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从 1897 年到 1935 年的近 40 年间，中国银行业蒸蒸日上，有了极大的发展。总计有总行 164 家、分支机构 1597 个，佼佼者如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、浙江实业银行、浙江兴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盐业银行、中南银行、大陆银行、新华信托储蓄银行、四明银行、聚兴城银行等。这些银行兴旺发达的标志是，银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高大雄伟，夺人眼目。

中国最早的银行大楼建于 1882 年，是大清银行大楼，耗资 1000 万两白银，位于北京西交民巷 27 号。清朝垮台后，1912 年 2 月，中国银行买下大清银行大楼做总行大楼。随后兴起的银行大楼有：1921 年建在上海北京路的四明银行大楼，1926 年建在上海四川中路的刘鸿生的企业银行大楼、建在上海四川路的东亚银行大楼、建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对面的金城银行大楼。

1929 年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（以下简称上海银行）修建银行大楼，位于今天上海市宁波路 50 号，由著名通和洋行设计，七层高，钢混框架结构，深红色墙体透着浓郁的古典气息，门厅高大，营业厅结构精致，内部装饰富丽堂皇，周详实用。上海银行的创始人是陈光甫。在陈光甫的领导下，上海银行从上海最小的银行，经过 10 余年发展，一跃成为著名的江浙财团南四行之一，资产总额 4700 万元，分支机构 111 个，职工 2775 人，存款总额近 2 亿元，位居上海私营银行之首。上海银行新大楼一经亮相，立即成为上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观赏，伸大拇指说顶呱呱。

紧随其后，盐业银行大楼建于 1931 年，中国垦业银行大楼建于 1932 年，大陆银行大楼建于 1932 年，国华银行大楼建于 1933 年，中汇银行大楼建于 1934 年，四行储蓄会大楼建于 1934 年，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建于 1935 年。

大陆银行成立于 1919 年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 6 号，董事长谈荔孙，总经理曹国嘉，股东有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，辩帅张勋，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，财政部次长李思浩、吴鼎昌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，江苏督军李

纯，江苏省长齐耀琳，浙江省长齐耀珊，江宁镇守使齐燮元，江苏省财政厅长俞仲韩，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、副总裁张公权，京剧大师梅兰芳。

大陆银行有这样的背景，想不赚钱也不行，成立当年即盈利 22 万元，于是增资，由实收 50 万元，3 次增资至 1000 万元。7 年时间，从 1919 年到 1926 年，股本扩大 20 倍，创造资本扩张奇迹。大陆银行上海分行建于 1920 年，11 年后，经理叶薰决定修建银行大楼，原因有三条：一是大陆银行发展良好，到 1926 年底有分支机构 11 处、行员 217 人、资产总值高达 3.8 亿元；二是在上海及周边的业务超过京津；三是多家银行总部齐迁上海，龙腾虎跃，竞争更加激烈。

大陆银行大楼从 1931 年 5 月开建，承造商是上海慎昌洋行，造价 85 万元。开工不久，遇晴天霹雳，爆发九一八事变。大陆银行董事会开会研究决定，修银行大楼是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，再困难也不停工。1933 年 11 月，上海大陆银行大楼竣工，钢混结构，上下 10 层，为中国古典宫殿风格，设有纯钢保管箱 1182 只，首创出租保管箱业务。4 年后，抗战全面爆发，北京陷落，大陆银行总部迁来上海，幸好未雨绸缪，到上海便住进这幢大楼。

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创办的。中汇银行大楼建于 1934 年 9 月，地点在今天上海河南南路口，耗资 156 万元，请中国建筑师黄日鲲、法国建筑师赖安吉爱共同设计，委托久记营造厂承建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红砖清水外墙，高 15 层，法国立体式样，集银行、写字间、公寓于一体。中汇银行大楼 3~9 层为写字间，共 200 余间，进驻有商行、事务所、办事处、经营部等 140 多家。10~12 层为西式公寓，每套有正屋 3 间或 5 间，附有浴室、厨房伙食间及仆人室等，厨房伙食间有煤气、冰箱、洗物器、食橱。13 层为行员休息所。再上 2 层为水塔，屋顶平台可供住户散步。整个大楼内部设有 3 部电梯，上下方便。

四行储蓄会与众不同，干脆建起一幢雄伟的上海国际大饭店。1923 年，中南银行、盐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大陆银行共同组建四行储蓄会，各出资 25 万元，目的是承担中南银行发行钞票的兑现责任，同时享有发行钞票的利益。四行储蓄会经营有方，从 1923 年到 1936 年，13 年时间，资产总额猛增到 1 亿元，增值 100 倍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。天津政协编印的《北四行简况》介绍说：

北四行联营的第二项业务，就是吴鼎昌在 1923 年倡办的四行储蓄会。四行储蓄会并无资本，只由四行作为基本储户，各存基本储金 25 万元，实际上是借用四

行的信誉，开了家没有资本的银行。四行储蓄会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，并用所谓“储户分红”的欺骗手法，招揽储蓄存款。第一年决算，一般储户除获得储蓄利息七厘外，还分得红利三厘七，两者合起来，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率。四行储蓄会的纯利润，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期间，由63000元，增加到85万余元，增长了12倍以上。据统计，从1923年到1936年，仅13年时间，四行储蓄会积累资产总额达1亿余元，储蓄存款9000万元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储蓄银行。^①

四行储蓄会仅在1931年就有1000万元收益。他们把巨额现金存放在自家的金库里，定期组织社会记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前来库房实地考察，向社会公开展示雄厚实力。不过银行赚钱靠放贷，要是有钱放不出去压在库房，不但影响收益，还有金融风险，钱多了也有麻烦。所以，四行的高层，金城周作民、盐业的吴鼎昌、大陆的谈荔荪、中南的胡筠，有的建议投资炒外汇，有的建议投资房地产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四行储蓄会这时的总负责人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。他接到这些意见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想来想去，又找了许多内行做参考，最后做出一个特殊的决定，修建上海国际饭店。当事人上海富商贾仰山、杜月笙门人杨淮北回忆说：

吴鼎昌向来认为世界局势不稳，金价必涨，因而极为重视外汇资产，对房地产也感兴趣。所以，四行储蓄会虽然自办放款，数量并不多，与金城等行合作投资企业也就少了。在1931年左右，钱新之认为四行储蓄会手存外汇太多，风险不小，曾经作过动用这些外汇资金的几个方案，但吴鼎昌都不同意，两人之间弄得很僵，最后决定投资自建国际饭店的22层大楼。^②

钱新之这时是中央银行理事、交通银行常务董事。他的意见是把四行储蓄会的这外汇用作外汇市场。吴鼎昌不同意，不愿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，便联络其他三家银行的老板，金城的周作民、大陆的谈荔荪、中南的胡筠，利用自己首轮担任四行储蓄会负责人的机会，否定了钱新之的意见。

大家之所以支持吴鼎昌，还不仅仅是为解决空闲资金出路，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修建一幢上海最高、最豪华的银行大楼，可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，让广大储户充满信心，踊跃到北四行存钱。当事人、上海国际饭店经理孙立已1962年回忆说：

① 天津市政协秘书处编：《北四行简况》，1976年6月版，第25页。

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：《金城银行史料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14页。

我参加四行工作时大楼已在动工。最初大楼原拟定名为四行大厦，后因为开设国际饭店，就称为国际饭店大厦。四行当局建筑这座大厦的动机想来主要是二个原因。

第一，资金有多，需要投资。当时（1931年前后）认为最可靠的投资是房地产及外币与国外债券。听说四行储蓄会打算以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房地产。包括国际饭店外，还拟兴建四行仓库、虹口公寓及职工宿舍等。当时各银行及个人投资房地产的非常多，地产价格猛涨。这是促成兴建国际饭店的最主要原因。第二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是对存户最有吸引力的广告。我觉得四行当局是懂得广告在银行和商业中起绝大作用的人。四行储蓄会的存户零星的居多，聚沙成塔，尤其需要有广告。

果然，大厦建成后，不仅各地四行储蓄会的存款都大大增加，就是四行本身的存款也有了增加，四行在社会上的信誉也有所提高。^①

于是开始购地建房，用45万两白银，购进上海派克路（今黄河路）2.7亩地，委托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做设计、上海陶馥记营造厂建造，历经3年多时间，耗资500万元，于1934年12月落成。上海国际饭店有24层高（其中，包含地下2层），当时是中国，也是远东第一高楼，成为中国银行的象征。70多年后的今天，上海国际饭店大楼还屹立在上海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接二连三修建起来的银行大楼，显示了中国与在华外国资本家竞争的决心和信心，自然引来外资的排挤和打压，比如随后修建大楼的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，节外生枝，平白生出事来。

中国银行当时的总经理是张嘉璈。1934年，他看了上海中国银行报送来的修建银行大楼的报告，英国公和洋行设计，一座双塔形，高91米，34层，比隔壁沙逊大厦高出一截，造价预算1000万元。张非常满意，签字认可，批准执行。中国银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，有资格也有实力修建一幢最高大的银行大楼，以显示其银行霸主地位。前面介绍了，大陆银行大楼耗资85万元，中汇银行大楼耗资156万元，四行储蓄会大楼即国际饭店耗资500万元，而中国银行大楼预算1000万元，张嘉璈认为理所当然。关于当时中国银行的实力，复旦大学历史教授吴景平撰文指出：

据统计，至1934年末，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在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行之中占

^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：《金城银行史料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14页。

52%，在全国各银行的资产总额中占23%；发行额在三行之中占51%，在全国银行中占三分之一；存款总额在三行中占49%，在全国银行中占18%；贷款额在三行中占55%，在全国银行中占20.52%。^①

照中国银行的实力，这个计划应当顺利实现，可中国银行大楼最后修建起来却矮了一大截，不是计划的34层，而只有17层，不是比邻居沙逊大厦高，而是矮了1米，令世人大惑不解。这又是何故？

金融作家刑建榕认为，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是“中行财务状况不容乐观”。有人说，不是财务问题，是沙逊捣乱，强迫租界工部局不准中国银行大楼超过他的大厦。沙逊时年53岁，英籍犹太人，在印度继承大笔家产后，1923年来上海，贩卖鸦片、军火，投资房地产，建造包括沙逊大厦在内的几十幢大楼，开设华懋洋行等多家公司，成为上海首富。租界工部局听到这个不同意见，出来解释说，鉴于外滩环境管理问题，在沙逊大厦后来修建的大楼一律不准超过沙逊大厦。明眼人不难看出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就是沙逊捣乱。

沙逊捣乱的事发生在外国人控制的上海租界，华人在此矮人一等，可以理解，可金城银行在北平修大楼，是在自己国土上，照说没有问题，可还是遭到当局干涉，被迫削减楼层。花明柳暗，又是何故？金城银行老行员、当事人籍孝存、杨固之、徐国懋回忆：

1935年华北形势日趋恶化，冀东已有日伪组织，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，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，由宋哲元主持，任委员长，周作民被任命为委员。周以长期在沪主持金城行务为借口，不能来北平就职。宋对其不合作深为不满。适北京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因旧址狭小，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西口外新建大楼，建筑设计已被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批准，进行施工。当工程将竣，预备安装最高层大钟的时候，宋为泄愤，不准装设，后经北平电报局长何石杉（冯系的旧人为周同乡）向宋疏通，乃被迫削减钟楼与最高一层楼房，始告结束。^②

废除银两改币制

与银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，传统的钱庄业比翼齐飞，毫不示弱，特别是在

^① 许矛、顾关林、姜天鹰主编：《中国十大银行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1页。

^② 籍孝存、杨固之、徐国懋：《周作民遭遇的几次政治风险》，载于文昊编：《金融大亨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87页。

经营银子上面，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此银钱两业时有矛盾，演变成现代金融行业的龙虎斗。在若干矛盾中，最突出的是废两改元。废两改元是金融行话，简言之，就是废除千百年来用银子作货币的习惯，改为使用银元。这自然是银行的主张，而钱庄呢，则是相反，主张继续使用银两，哪怕与银元同时使用，并驾齐驱也行。于是中国的金融业便出现两种货币单位，同样是银子，银行讲元，钱庄讲两，谁也不服谁，弄得广大民众和工商业者怨声载道，甚至影响国际贸易换算。

这样的问题自然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，更谈不上精诚团结，共同对付日本经济侵略，因此引起一个人的高度关注，他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。1928年春夏之间，北伐军在取得最终胜利之际，弹冠相庆，喜笑颜开，唯独财政部长宋子文愁眉紧锁，郁郁寡欢，原因是新政权财政紧张，国库空虚，无法收拾北洋政府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这天，蒋介石召见宋子文，因百废待兴，没有资金，问他有何高见。宋子文回答：“办法自然有，就看你敢不敢采纳。”蒋介石问什么办法。宋子文便将自己苦苦思考出来的意见，管他接受与否，一股脑儿倒了出来。蒋介石听了肃然无语。

宋子文的办法就是废两改元，要废除千百年来用银两作货币单位的习惯，改为使用银元。这话说来简单，但实行起来，因为牵涉全国民众，牵涉众多钱庄、银行、工商业者、国内外贸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非常麻烦。但如果解决得好，那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更特别有利于新政权对全国经济的管控。

蒋介石与宋子文反复商量，又把这事提交最高国务会议研究，最后决定在上海、江苏、浙江试行办理，若行得通则全国推开。这件事之所以得到高层多数支持，除了蒋介石一言九鼎，全力肯定，还有一个历史渊源。换句话说，废两改元并不是宋子文首创，在他之前便有有识之士先后提出。1918年，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之际，便有人大声疾呼：民国当废两改元。1921年，全国银行公会向北洋政府提出建议，民国以来银元越发流通，与历来通行的银两并行于世，多有不便，建议废除银两，改铸旧币，统一币制。1923年，上海出现货币流通危机，原因是银两稀缺，银元泛滥，上海银行公会建议银洋并重，改变传统“两重元轻”局面。而上海钱业公会素来重视银两，上书北京政府，反对上海银行公会建议，主张维持原状。

如此种种，宋子文自然一清二楚，他更看中的是一个最新方案，那就是经